

王明蓀主編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第十二冊

##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周能俊著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王明 蔭主編

第 12 冊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周能俊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周能俊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20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12 冊）

ISBN 978-986-404-609-6（精裝）

1. 宗教地理學 2. 道教 3. 唐代

618

105002220

ISBN-978-986-404-609-6



9 789864 046096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404-609-6

##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作 者 周能俊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74925 字

定 價 十五編 23 冊（精裝）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代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周能俊 著

## 作者簡介

周能俊，男，1980年出生於浙江杭州。2010年獲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2013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人文社科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歷史地理。先後在《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揚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國道教》等核心刊物上發表多篇相關論述，部分論文曾分別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新華文摘》轉載或摘編。作者作為研究負責人先後承擔了浙江省哲社規劃重點課題（省部級）等多項科研項目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較高的學術成果與社會評價。

## 提 要

唐代是道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宮府圖》與《名山記》所載內容分別反映了唐代前期與後期道教洞天福地的分佈特點。《名山記》是在繼承《宮府圖》的基礎上，結合唐後期道教的具體特點而成的。總體來說，唐代形成了以長安、洛陽兩京，巴蜀，江南，長江中游，嶺南五大核心，結合周圍地域形成若干洞天福地集群的分佈特點。唐五代投龍活動在唐前期是較為繁盛的時期，安史亂後投龍活動漸趨稀少。根據記載，絕大部分投龍活動為奉旨實行，或地方官府組織；個人或地方教團倡行的頗為少見。投龍的目的也以祈雨或祈福為主，間或為了求仙及除罪。投龍的地域則集中在以泰山為首的五嶽四瀆等名山大川之中，江南和巴蜀地區的山川投龍活動較多。隋唐五代時期，長安、洛陽、揚州、成都四個都市分佈著大量的道教宮觀。乃是繼承了南北朝隋代的基礎並發展而成的。唐前期是宮觀興建的頂峰，唐後期五代是以重建、修繕為主。從唐後期開始，兩京的道教中心地位向江南、巴蜀傾斜。唐代基層社會道教信仰頗為興盛。其中，造像活動盛行，乃是佛道競爭，及李唐政權與地方官僚士紳等共同推崇的結果。遊方道士則是道教深入基層社會的重要因素。造像與圖像也對基層民眾理解道法教義有極大的幫助。而自然條件、經濟情況、人口因素、交通狀況、政治局勢、歷史基礎六大要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唐代道教地理分佈的特點和現實狀況。

2015 年度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  
研究基地·浙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重點課題「唐五代兩浙地域道教的時代變遷與空  
間分佈」(15JDLS01Z)

2014 年度浙江省社科聯研究課題  
「五代吳越國道教地理分佈專題研究」  
(2014B106)

2015 年度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  
「唐代道教的時代變遷與空間分佈」  
(Y201534582)



#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唐代道教地理的意義	1
第二節 唐代道教地理的研究現狀	2
第三節 概念界定與主要內容	9
第一章 唐代道教洞天福地地理分佈——以司馬承禎《天地宮府圖》與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為中心	11
第一節 洞天福地考異	13
一、洞天考異	14
二、福地考異	20
第二節 洞天福地分佈情況與特點	28
第三節 分佈原因探析	35
結論	39
第二章 唐五代道教投龍時空分佈	51
第一節 唐五代投龍地域分佈情況	53
第二節 唐五代投龍活動的特徵	77
第三節 投龍活動盛衰之原因	84
結論	88
第三章 唐五代四大都市道教宮觀分佈	91
第一節 四大都市宮觀的地理分佈	94

一、長安道教宮觀	94
二、洛陽道教宮觀	105
三、揚州道教宮觀	110
四、成都道教宮觀	114
第二節 四大都市宮觀分佈特點	120
第三節 四大都市宮觀分佈之原因	122
結 論	125
第四章 唐代基層社會的道教信仰	127
第一節 唐代有關造像等道教活動的風氣及其興盛的原因	130
第二節 唐代基層道教信仰的情況	133
第三節 道教與基層民眾的生活	138
第四節 道教在基層社會的作用	141
結 論	146
結 語	149
參考文獻	153
附錄一 漢唐「天狗」考釋	173
附錄二 天象與世變：漢唐時期的「枉矢」星占	183
附錄三 天象與世變：漢唐時期的「蚩尤旗」星占	197



#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唐代道教地理的意義

宗教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它與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一方面，任何一種宗教的形成、傳播和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空間範圍，受到地理環境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宗教一經形成，就會反作用於地理環境，並成為地理環境的組成部分。宗教地理學乃是探索一定文化地域中的宗教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宗教的傳播、發展不僅具有地域性，同時又是一個歷史過程，具有明顯的時代差異。探求歷史時期宗教發展的空間組合與地域特性，闡述宗教地域差異的歷史成因，是歷史宗教地理學的任務。

道教是中國特有的宗教，形成於東漢後期，在中國特有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中國道教發展到唐代進入了鼎盛時期，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而道教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又具有強烈的區域差異，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因此，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研究唐代道教地理，就更加顯得重要和意義非凡。

歷史文化地理是應該包括歷史道教地理的。目前學界對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歷史道教地理相對於歷史佛教地理來說，又是其中最為薄弱的分支之一。加強歷史道教地理的研究，對歷史文化地理，甚至歷史地理的學科建設與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就唐代而言，許多地理現象，特別

是人文地理現象區域特徵的形成、發展，都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毫無疑問，唐代道教地理的研究，有助於唐代文化地理和唐代地理的研究，有助於唐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情況的研究。此外，當代的道教地理現象根植於歷史時期的道教地理情況。所以，開展歷史時期的道教地理，特別是道教極盛時期的唐代道教地理的研討，對於當代道教地理的研究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

魯迅先生曾言：「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註1〕。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就不能不研究道教，否則，就無法瞭解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歷史。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道教史的研究愈見興盛，成果頗豐。這方面的著作中也涉及一些地域道教發展的情況，但受到種種的限制，往往只是泛泛而論，或者避而不談。然而，道教的發展歷史和不斷變化的地理環境之間有著難以割裂的聯繫，離開了特定的地理環境，許多道教歷史現象就難以理解。探討唐代道教傳佈、發展的時空差異及其成因，對於唐代道教史，甚至中國道教史的研究都極為有益。它可以為道教史的研究架構起一個較為清晰的空間情境，並使之更豐富、更深入。

道教地理的研究還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例如道教景觀（宮觀、石窟造像、石刻碑誌等）是當前各地十分重要的區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旅遊資源。充分利用和開發這些文化資源，成為各地政府發展經濟、提升本地文化品位的重要舉措。歷史道教地理在這方面顯然大有可為，也是在實踐方面的意義之一。

## 第二節 唐代道教地理的研究現狀

相對於佛教地理研究的興盛情況，道教地理研究則顯得頗為寂寥。無論是研究的深入程度，還是論著等成果皆遠不能和佛教地理研究同日而語。許多道教研究者對道教地理這一研究領域皆不涉及，即使是一些頗為權威的道教通史論著也避而不談。如許地山先生《道教史》〔註2〕涉及道教地理領域的研究較為簡略。傅勤家先生《中國道教史》〔註3〕一書則在論述道教地理有關

〔註1〕魯迅：《致許壽裳》，見《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兩地書 書信（1904~1926）》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5頁。

〔註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註3〕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

的洞天福地時，僅羅列司馬承禎的《天地宮府圖》所載內容。湯一介先生《早期道教史》〔註4〕一書也未論及道教地理的有關內容。其餘如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註5〕、卿希泰、唐大潮先生所著《道教史》〔註6〕，牟鍾鑒、胡孚琛、王葆玟先生主編的《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註7〕，李養正著《道教概說》〔註8〕，潘雨廷《道教史叢論》〔註9〕等著作亦無道教地理的任何論述。卿希泰先生在《百年來道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註10〕一文中也沒有關於道教地理研究的專門敘述。法國索安所著《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註11〕一書在第五部分「道教世界」中僅以不到3頁的篇幅來論述「宗教地理」的研究狀況，研究時限從1910年縱跨至1990年代。其餘無論是楊雲《道教研究現狀》〔註12〕一文所回顧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的大陸道教研究，還是張澤洪《20世紀以來日本的道教研究》〔註13〕、盧睿蓉《美國的中國道教研究之管窺》〔註14〕與張崇富《繼承漢學傳統：荷蘭道教道教研究的成就與最新進展》〔註15〕等介紹中外道教研究綜述性的文章較少關於道教地理研究方面的介紹。可見，道教地理在中外道教研究中處於相對薄弱的尷尬境地。

然自近代以來，還是有不少中外學者在這一研究領域有所著墨的。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註16〕一文可說是中國道教地理研究里程碑式的論著。錢穆《蜀中道教先聲》、《張道陵與黃巾》〔註17〕二文討論了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道教在巴蜀地區和中原地區的流傳、分佈情況。陳國

〔註4〕北京：崑崙出版社，2007年。

〔註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註6〕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註7〕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

〔註8〕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註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註10〕卿希泰：《卿希泰論道教》，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5～208頁。

〔註11〕呂鵬志、陳平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註12〕《哲學動態》1988年第06期，第32～34頁。

〔註13〕《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02期，第29～34頁。

〔註14〕《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02期，第37～41頁。

〔註15〕《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03期，第38～45頁。

〔註16〕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46頁。

〔註17〕《責善半月刊》1941，11。

符先生《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註 18〕中「設治第四」部分詳細考證了道教諸治所在。唐長孺先生《范長生與巴氏據蜀的關係》〔註 19〕一文涉及蜀漢至東晉十六國時期道教在巴蜀地區的流傳、分佈情況；《魏晉期間北方天師道的傳播》〔註 20〕一文則討論了魏晉時期天師道在黃河流域的流傳和分佈情況；《錢塘杜治與三吳天師道的演變》〔註 21〕一文則可視為陳寅恪文的深入探討；而《太平道與天師道——札記十一篇》〔註 22〕一文涉及天師道初期傳播情況，宗教組織「治」，黃巾起義後太平道的傳播情況，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地區的天師道傳播情況，以及江南地區天師道的傳播情況等多個方面的研究。盧雲《漢晉文化地理》〔註 23〕一書中對三國西晉早期道教的傳播與區域研究有所論述。伍偉民《江西道教述略》〔註 24〕一文對江西的道教做了簡略的概述。游建西《道家道教史略論稿》〔註 25〕一書對道教洞天福地與中華山水文化做了一定的論述，頗具參考價值。還有賈發義〔註 26〕、王麗英〔註 27〕、趙益〔註 28〕、曾維加〔註 29〕、衛復華〔註 30〕、郭樹森〔註 31〕、盛愛萍〔註 32〕、張妙〔註 33〕、任林豪〔註 34〕、孔令宏〔註 35〕、吳國富〔註 36〕、林正秋〔註 37〕

〔註 18〕 陳國符：《道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306～367 頁。

〔註 19〕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 年，第 155～162 頁。

〔註 20〕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18～232 頁。

〔註 21〕 唐長孺：《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182～201 頁。

〔註 22〕 唐長孺：《山居存稿續編》，第 256～288 頁。

〔註 23〕 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

〔註 24〕 伍偉民：《易山道海得涓埃：道教文化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33～138 頁。

〔註 25〕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

〔註 26〕 賈發義：《山西道教歷史發展特點析論》，《宗教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1～10 頁。

〔註 27〕 王麗英：《道教南傳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4 年。

〔註 28〕 趙益：《句曲洞天：公元四世紀上清道教的度災之府》，《宗教學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57～63 頁。

〔註 29〕 曾維加：《道教的社會傳播研究——以公元六世紀前巴蜀及中國北方為中心》，四川大學宗教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4 年。

〔註 30〕 衛復華：《中國道教（五斗米道）發源地鶴鳴山》，《宗教學研究》1989 年 Z1 期，第 6～11 頁。

〔註 31〕 郭樹森：《江西道教概說》，《中國道教》1995 年第 3 期，第 31～33 頁。

〔註 32〕 盛愛萍：《從溫州地名看浙南的道教文化》，《浙江社會科學》2003 年第 3 期，第 188～192 頁。

〔註 33〕 張妙：《唐宋峨眉山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 年。

等先生的論述也極具意義。

臺灣地區蕭登福先生長期致力於道教研究，出版和發表了一些關於道教的論文和專著。其《道教與民俗》〔註38〕一書從民俗的角度來闡發與道教的關係，為道教地理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丁煌先生《漢末三國道教發展與江南地緣關係初探：以張道陵天師道出生說、江南巫俗及孫吳政權與道教關係為中心之一般考察》〔註39〕一文則探討了漢末三國時期江南的道教情況。近年來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主持出版了《中國傳統科儀本彙編》叢書，共分14個部分，分別以福建龍岩、建陽、壽寧，浙江磐安、上虞、永康，四川江津，廣西柳州，湖南會同、花垣，重慶接龍，江西高安、鉛山，上海南匯等地的道教地方材料為依據，論述了各地道教教派的傳播、代表人物、信眾分佈等各個方面，為進一步研究道教地理分佈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日本學術界對於道教地理方面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研究成果。如道端良秀《山東道教史蹟巡禮》〔註40〕一文記述了當年考察全真教傳教路線的情況。蜂屋邦夫主編《中國的道教》〔註41〕之「活動及道觀現狀」部分頗有涉及道教地理分佈之內容。麥穀邦夫等著《江南道教的研究》〔註42〕涉及了江南道教的一些地理分佈情況。宮川尚志在其《六朝宗教史》〔註43〕第七章《民間の巫祝道と祠廟の信仰》（修訂增補本）中論述了六朝時期的基層道教信仰，並在其的論文“Legate Kao P'ien and a Taoist Magician Lü Yung-chih in the Time of Huang Chao's Rebellion”（1974、《黃巢起義時期的節度使高駘和道教方士呂用之》）〔註44〕與“Local Cults around Mount Lu at the Time of Sun En's Rebellion”（1979、《孫恩起義時廬山附近的地方崇拜》）〔註45〕中討論了六朝

〔註34〕任林豪、馬曙明：《台州道教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註35〕孔令宏、韓松濤：《江西道教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註36〕吳國富：《廬山道教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註37〕林正秋：《杭州道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註38〕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註39〕《歷史學報（成大）》13（1987），第155～208頁。

〔註40〕《東方宗教》創刊號，日本道教學會，1951年。

〔註41〕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5年。

〔註42〕平成十五年～平成十八年度（2004～2007）科學研究補助金基盤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

〔註43〕東京：國書刊行會，1974年。

〔註44〕Acta Asiatica 27：5～99。

〔註45〕FT (Factes of Taoism, H. Welch and A. seidel, e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隋唐時期淮南道與廬山及其周邊地域的道教信仰情況。秋月觀暎《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道的基礎研究》〔註46〕一書對西山、逍遙山、旌陽縣等地的地理位置、名稱來歷等做了考證。此外，酒井忠夫〔註47〕、上田正昭〔註48〕、吉岡義豐〔註49〕等先生的研究亦頗具參考價值。

歐美學界在這一領域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如 Edouard Chavannes “*Le T'ai-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泰山——有關一種中國崇拜的專題論文》）〔註50〕和 “*Le jet des Dragons*”（《投龍》）〔註51〕、Paul Demiéville 的 “*Le T'ai-chan ou Montagne du suicide*”（1924、《泰山或捨身之山》）〔註52〕、Michel Soymié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1956、《羅浮山，宗教地理研究》）〔註53〕、Giuliano Bertuccioli “*Reminiscences of Maoshan*”（1974、《茅山回憶錄》）〔註54〕、Hou Ching-lang “*The China Belief in Baleful Stars*”（1979、《中國的災星信仰》）〔註55〕、Edward H. Schafer “*Mao Shan in T'ang Times*”（1980、《唐代的茅山》）〔註56〕、Paul W. Kroll “*Verses from on High: The Ascent of T'ai Shan*”（1983、《詠高詩——登泰山》）〔註57〕與 “*In the Halls of the Azure Lad*”（1985、《在青童府中》）〔註58〕、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1985、《中國唐宋時期的城隍神崇拜》）〔註59〕、Kristofer

---

*Press, 1979), pp.83~101.*

〔註46〕 丁培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註47〕 酒井忠夫 “*Taoist Studies in Japan*”，FT，pp.269~87.

〔註48〕 上田正昭：《古代信仰と道教》，見福永光司等編《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東京：徳間書店1978年，第51~95頁。

〔註49〕 吉岡義豐 “*Taoist Monastic Life*”，FT，pp.223~52.

〔註50〕 *Le T'ai-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Annales de Musée Guimet 28, pp.415~24.

〔註51〕 “*Le jet des Dragons*”，*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3. Translation of the T'ai-shang ling-pao yü-yi ming-chen ta-chai yen-kung yi.*

〔註52〕 “*Le T'ai-chan ou Montagne du suicide*”，in *L'Echo des Alpes. Reprinted in 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Leiden*” E.J.Brill, 1973, pp.1~7.

〔註53〕 *BEFEO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8 : 1~139.

〔註54〕 *East and West*, n.s.24.3~4 : 3~16.

〔註55〕 FT, pp.193~228.

〔註56〕 *SSCR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Monograph No. 1. Revised edition, 1989.*

〔註57〕 *TP (T'oung-Pao)* 69 : 223~60.

〔註58〕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5.1 : 75~94.

〔註59〕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 : 363~457.

M. Schipper “*Taoist Ritual and Local Cults of the T’ang Dynasty*” (1985、《唐朝的道教儀式和地方崇拜》)〔註60〕、Stephen R. Bokenkamp “*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 (1986、《桃花源和洞穴通道》)〔註61〕、Kenneth Dean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Southeast China: History and Revival*” (1988、《中國東南的道教與民間宗教——歷史和復興》)〔註62〕、Thomas Hahn “*The Standard Taoist Mountain and Related Features of Religious Geography*” (1988、《標準的道教山嶽和相關的宗教地理特徵》)〔註63〕、Valerie Hansen “*The Popular Pantheon During the T’ang-sung Transition*” (1989、《唐宋過渡時期的民間諸神》)〔註64〕、Poul Anderson “*A Visit to Hua-shan*” (1990)〔註65〕和《祭祀與禮拜模式：福建南部的宗教復興》(1995)、Raoul Birnbaum “*Secret Halls of the Mountain Lords: The Caves of Wu-t’ai Shan*” (1990、《山神的密室——五臺山的洞窟》)〔註66〕、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 “*Le taoïsme du Mao Chan-chronique d’une revelation*” (1981、《茅山的道教——降經編年史》)〔註67〕、韓明士《道與庶道：宋代以來的道教、民間信仰和神靈模式》〔註68〕、高延(Jan Jaob Maria de Groot)《中國的宗教系統及其古代形式、變遷、歷史及現狀》(*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註69〕等。

關於唐代道教地理，柯瑞思(Russell Kirkland)《唐代道教的多維度審視：20世紀末該領域的研究現狀》〔註70〕一文中概括總結了二十世紀末唐代道教

〔註60〕 *TTS III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III, M. Strickmann ed. MCB X XII, Bruxelles, 1985), pp.812~34.*

〔註61〕 *JAOS 106: 65~77.*

〔註62〕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8.

〔註63〕 *CEA (Cahiers d’Extrême-Asie) 4: 145~56.*

〔註64〕 *Paper for the Symposium o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China 750~1300.* Hsi Lai Temple, Los Angeles.

〔註65〕 *CEA 5: 349~54.*

〔註66〕 *CEA 5: 115~40.*

〔註67〕 *Le taoïsme du Mao Chan-chronique d’une revelation, Mémoires de l’IHEC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XVIII.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註68〕 皮慶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

〔註69〕 Leiden. E.J. Brill, 1892.

〔註70〕 曾維加、劉玄文譯，見(英)巴瑞特著、曾維加譯《唐代道教——中國歷史上黃金時期的宗教與帝國》，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第118~156頁。

研究的景況，卻對唐代道教地理研究總結的較少。《二十世紀唐研究》〔註 71〕一書中亦少有關於唐代道教地理研究的總結與回顧。截止到目前，唐代道教地理的研究雖有一些，但只有一些小規模、局部性的研究成果。如嚴耕望〔註 72〕、李廷先〔註 73〕、朱越利〔註 74〕、何海燕〔註 75〕、王麗英〔註 76〕、張澤洪〔註 77〕、王永平〔註 78〕、周奇〔註 79〕、王承文〔註 80〕、盛愛萍〔註 81〕、孔令宏〔註 82〕、徐雪凡〔註 83〕、羅燚英〔註 84〕、溫玉成〔註 85〕、劉凱〔註 86〕、劉屹〔註 87〕、

- 〔註 71〕 胡戟、張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 〔註 72〕 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見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 175~231 頁。
- 〔註 73〕 李廷先：《唐代揚州的道教》，《東南文化》1990 年 5 月 Z1 期，第 46~51 頁。
- 〔註 74〕 朱越利：《釋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記〉》，《浙江學刊》1990 年第 1 期。
- 〔註 75〕 何海燕：《唐代道教地理分佈特徵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 年。
- 〔註 76〕 王麗英：《道教南傳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
- 〔註 77〕 張澤洪：《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轉型：以唐代長安道教為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1 期，第 46~52 頁；張澤洪、景志明：《唐代長安道教》，《宗教學研究》1993 年 Z1 期，第 1~8 頁；張澤洪：《唐代敦煌道教的傳播》，《中國文化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59~64 頁。
- 〔註 78〕 王永平：《隋末唐初的山西道教》，《滄桑》1999 年第 1 期，第 18~22 頁。
- 〔註 79〕 周奇：《邊緣到中心：唐宋江西道教研究》，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2 年。
- 〔註 80〕 王承文：《唐代羅浮山區文化發展略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3 期，第 74~82 頁。
- 〔註 81〕 盛愛萍：《從溫州地名看浙南的道教文化》，《浙江社會科學》2003 年第 3 期，第 188~192 頁。
- 〔註 82〕 孔令宏：《浙江道教史發凡》，《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第 31~36 頁。
- 〔註 83〕 徐雪凡：《從浙江道教碑刻看浙江道教發展史》，見連曉鳴主編《天台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註 84〕 羅燚英：《東晉南北朝迄唐北嶽恒山道教探述》，《閩江學刊》2010 年第 5 期，第 72~79 頁；《廣州五羊傳說與五仙觀考論——漢晉迄宋嶺南道教微觀考察》，《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第 104~110 頁。
- 〔註 85〕 溫玉成：《隋唐洛陽道教略述》，《中國道教》1990 年第 2 期，第 35~38 頁。
- 〔註 86〕 劉凱：《六朝到唐宋連州靜福山的道教發展——以唐蔣防〈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為中心》，《嶺南文史》2011 年第 4 期，第 30~36 頁。
- 〔註 87〕 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王靜〔註 88〕、曾國富〔註 89〕，臺灣的詹宗祐〔註 90〕、廖幼華〔註 91〕，日本的吉川忠夫〔註 92〕，歐美的 Edward H Schafer、Michel Soymie、王羅傑（Roger Greatrex）〔註 93〕等先生即著眼於唐代某一地域的道教傳佈、特徵等的研究。這些研究為進一步的深入討論打下了十分堅實的基礎。但是，這些研究在內容上不夠全面，一些唐代道教地理的重要因素被忽略了；或者在地域上限於局部地區。總體來說，唐代道教地理全面系統的研究工作還處於萌芽的狀態。這一研究現狀是與唐代道教的盛景不相稱的。

### 第三節 概念界定與主要內容

爲了釐清本文的研究範圍和研究內容，首先需對本文所涉及的幾個主要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

1、唐代：本文按照一般傳統將唐代定義爲公元 618 年李淵建立的定都於長安，至公元 907 年被朱全忠篡奪的李姓帝國。其中包括了公元 690 至 704 年武曌建立的武周政權。但由於行文及內容追述的需要，本文個別章節所涉時限上推至楊隋帝國（581~618），下延至五代（907~960）。由於所論時限範圍絕大部分處於唐代，故本文題目統以「唐代」名之。而具體章節時限涉及隋、唐、五代等時代處，則明確注明所論之具體時限。

2、道教：本文以唐代道教爲主要研究對象，故所論之道教活動、稱謂、科儀等均以唐代道教之敘述爲標準。文中所涉其餘有關道教的概念等亦一以唐代道教爲準。若由於史闕其載等原因致使唐代道教有關材料難以爲據的，

〔註 88〕 王靜：《終南山與唐代長安社會》，《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29~168 頁。

〔註 89〕 曾國富《道教與五代吳越國歷史》，《宗教學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33~39 頁。

〔註 90〕 詹宗祐：《隋唐時期終南山區研究》，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 年；詹宗祐：《試論隋唐時期終南山區的旅遊》，《白沙歷史地理學報》2006 年第 1 期，第 1~36 頁。

〔註 91〕 廖幼華：《唐宋時期嶺南主要宗教信仰之分佈》，《東亞民俗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 年，第 195~239 頁。

〔註 92〕 （日）吉川忠夫著、曾維加、黃小玲譯《唐代巴蜀的佛教與道教》，見《唐代道教——中國歷史上黃金時期的宗教與帝國》，第 96~117 頁。

〔註 93〕 Roger Greatrex：《茅山道教與唐宋文人》，見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第 367~387 頁。